

锐评



“云时代”的商业秘密该何处藏身

■ 特约评论员 江金骐

近日,国内安全漏洞监测平台 10 月 10 日通过媒体发布报告,称如家、汉庭等大批酒店的开房记录被第三方存储,包括客户名、身份证号、开房日期、房间号、甚至两个人的会话等大量敏感、隐私信息都有泄露。

这个爆料绝非孤案,不久前,众所周知的由斯诺登揭开的“棱镜门”,堪称案例中的经典。人民网曾做过一项网民调查,90%的受访网民表示曾遭遇个人信息泄露,89%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堪个人信息泄露之扰。

早在九年前,笔者就曾写过《九成电脑或遭间谍软件监视》一文,以上案例恰恰印证了我当初的判断。如今,人们对互联网应用早已从 PC 应用过渡到大数据时代。技术进步当然是好事,但是,随着公民的隐私客观上都变成了不同形式的数据进行存储,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潜在风险也越来越大。

个人隐私尚且不保,商业秘密又岂能金身不破? 数据显示,仅去年较大的商业泄密事件就达 30 余起,其中,东软集团因商业秘密外泄,给公司造成 4000 余万元人民币的损失,此外,亚马逊、江苏银行、苹果、三星、

不管接受与否,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。如果个人隐私尚且不保,商业秘密又岂能金身不破?

1 号店及上海市卫生局等泄密案,都让当事企业如芒在背。总结其中教训,除了一部分是人为泄密,一部分是因为本单位信息资源库遭受黑客入侵,用户信息被解密。

不管接受与否,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。现在,很多公司都将图纸、文档、财务报表、研发资料等,以电子文档形式保存在终端上,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。这些存储在计算机网络中的电子文件,相比于传统纸质文件,由于管理权限分配不当或者加密技术不到位,常在不经意间遭受“裸晒”。这次如家和汉庭的信息泄露,分析其原因,一说是系统运营商管理不善,一说是商家使用不慎,不管怎样,事情既已发生,当事个人和企业(用户)无疑都是其中的受害者。

面对技术进步和几何级数的信

息增长,对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的保护显然已刻不容缓,有专家为此建议,一方面,立法部门需要使法律更加具体和细化,以更快更及时的反应机制,为监管部门提供及时有效的监管依据;另一方面,需要借鉴他国立法经验以及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,共同保护信息安全。

制度层面的解决办法是政府的事,作为企业而言,最关键、最紧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功课,善用运营商的服务。对自己来说,在大数据时代下,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,首先要求企业切切实实做好防火墙配备、IDS 启用、杀毒查马安装等传统“老三样”的防范工作,绝不能将企业信息和数据,放到国外的、或身世不明的分析应用平台,即使对方愿意免费提供相关服务。对国内运营商的选择,凡涉及公司重要

数据的传输,比如登录公司网银,如果操作者对这个软件没有把握,就必须慎用。选择的标准,主要是看运营商的口碑以及信用度等,“用户不是专家,除了慎重选择,没有别的办法。”

信息安全行业有“三分技术,七分管理”的说法。一个完整有效的内控系统,除了借用技术手段,严密的管理制度也不可或缺。国外有调查表明,公司商业秘密的安全挑战 80%来自内部;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中心的调查结果也表明,我国企业目前的信息安全问题,主要来自泄密和内部人员犯罪,而非病毒和外来黑客引起。从这一点上说,当技术无法完全满足企业全方位的数据安全需求时,制度的建立健全,理当成为企业信息安全的焦点。

除了要求用户(企业),从技术和制度上自铸铜墙铁壁,大数据时代要想实现企业信息安全的长治久安,运营商(企业)也有必要对自己的商业模式进行反省。专家们认为,将来互联网厂商向外提供企业信息时,要根据需要进行产销逆转,也就是说,一些敏感文件、知识产权、科研数据等信息数据,需要完备的访问控制和身份认证管理,以避免未经授权的数据访问。

(作者系媒体人)

来论



实业家“转身”:潇洒背后更是无奈

■ 蔡思泽

10 月 9 日,刘永好以 200 亿元的投资财富问鼎 2013 年“胡润投资富豪榜”首富,成为投资大王。实业家向投资家华丽转身,如今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,是大潮裹挟,还是名利驱使,抑或实业之心的沉沦?这斩不断理还乱的疑问撞击人们的心扉。

资本为王的时代,投资家是时代的宠儿,据说,“投资家坐在屋里,喝着茶,外边的强敌就灰飞烟灭了”,实在是令人羡慕。在世人心目中,投资家的名头仿佛比企业家更响亮和光彩。2006 年 6 月 30 日,曾经一手打造小霸王、步步高企业家段永平以 62.01 万美元的天价,竞拍到与“股神”巴菲特共进一次午餐的机会,拜师学艺。有多少企业家在功成名就之后涉足投行,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自己的智慧和能力。

事实上,投资行业确实也成就了许多人“二次创业”的梦想。联想的柳传志在退休之后精心打造的联想投资、弘毅投资、融科智地三驾马车,续写了联想的辉煌。20 年前与田溯宁一

看起来,实业家们在转型之后做得是风生水起。然而,投资行业的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,甚至有着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可能。

道第一次把 Internet 带回中国的丁健,在亚信 CEO 任上急流勇退,成为金沙江创投合伙人,目前金沙江创投旗下管理计 10 亿美元的基金,并和美国硅谷最老牌的创业投资基金 Mayfield Fund 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。

看起来,实业家们在转型之后做得是风生水起。然而,投资行业的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,甚至有着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可能。投资的风险无处不在。即使一个企业家在一个行业再有能力,贸然将脚踏到一个陌生的领域,也可能被“套”进去而成为冤大头。因此,从实业家变身投资家不是人人都玩得起的,不仅要有实力和眼光,也要有运气。

投资首先要有实力,当一个企业家占据一个行业的制高点,手中有大

把大把的银子,金钱对他而言只是一个符号时,他就有底气华丽转身,从实业家变身投资家。刘永好虽然本人比较节俭,但如果想要去投资某个项目过把投资家的瘾,还是有这个资本的。

另外,投资不仅要有眼光,还要有运气和智慧。史玉柱说,“我适合创业不适合守业,我一看,网游这块没什么新鲜感了,所以现在又搞银行去了。”他和刘永好对民生银行的成功投资,是睿智的投资眼光所及,当中也有运气的成分。

综上所述,投资行业并不是闲庭信步的花园小径,而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。有峭壁悬立之险,也有峰回路转之险,弄不好会迷失其间甚至坠崖。这些转型者,并不仅仅是因为自

己的眼光独特或者为了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,他们之所以敢于冒投资失败的风险,更多的还是有一种无奈。

比如,曾经感叹“十年农业收益抵不过一年房地产”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,如今终于也行动了。

实际上,一些从事实业的企业家转型做投资,是由于“下海”办实业呛了水,感觉办实业太累,想从投资渠道上赚一把;也有的民营企业家是在和国企打交道之后深感自己的弱小,于是转行从事投资工作,能赚多少算多少;而家族企业的延续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接班人,而眼下大多数“富二代”深知父辈打拼的艰难,做实业太难太累,不愿意接班,他们选择做投资人单打独斗,只能算是一个不怎么安全的无奈选择。

希望这些实业家进入到投资领域只是“玩一玩”,千万不要忽略掉自己的主业。如果中国的实业家们扎堆进入投资行业,不仅将自身置于风险之地,更会加剧中国实业空心化的困境。实业家们“变身”投资家要适可而止,千万别玩过头了。

(作者系晶苏传媒首席分析师)

对话



柯荆民:IPO 停摆冲击投行业务格局

■ 王莹

2013 年 10 月 10 日是 IPO 停摆一周年。在这一年的漫长等待中,IPO 生态圈已经起了巨大变化。

那么,停摆一年以来,IPO 生态圈发生了哪些变化?从核准制到注册制过渡的制度安排进展如何?与新股发行方案配套的一系列规则何时准备就绪?带着这些问题,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专访了原中债登和路透中国公司法律顾问、著名财经评论人柯荆民。

《中国企业报》:新股发行制度停摆对企业股权融资造成了哪些影响?一年来 IPO 生态圈发生了哪些变化?

柯荆民:在去年 10 月停止 IPO 后,从去年年底开始,证监会对在审企业进行了财务专项检查。共有 622 家企业提交自查报告,268 家企业提交终止审查申请,相当于 1/3 的企业放弃了利用股票市场进行融资。如同证监会所说,长时间停顿,不利于企业正常的股权融资活动。

IPO 停顿已经一年,对投行业务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在 IPO 停顿、无法通过 IPO 业务取得收入的情况下,券商投行大都往新三板、并购重组、再融资和债券等业务转型。但是,转型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,除新三板商机还比较大之外。债券市场前段时间一直在整顿,业务萎缩。而并购重组项目,券商投行能够进入的,大都是比较小的项目,不能保证稳定的收入。以前的 IPO 业务可以做成产业化和规模效应,从而能节省大量资源,而转型的新业务做不到这点。另外,由于 IPO 停顿导致的长期收入不佳,券商和投行行业也发生了一些人才流失。

《中国企业报》:据了解,新股发行要在改革意见正式公布实施后才能启动,那么,您觉得 IPO 重启的准确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?

柯荆民:对于 IPO 何时重启,现在有三个时间点:三中全会后、年内和明年。比如,德勤中国在日前出具的一份报告称,新股发行可能在三中全会前后重新启动。但是,最近证

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,新股发行要在改革意见正式发布实施后,才能启动,所有发行人都必须在符合新的改革意见要求前提下,才可发行新股。三中全会就有关改革的决定进行原则性规定后,证监会才能拿出改革意见,新的改革意见还需要经过讨论和国务院批准,今年年底可能有些来不及。

上周证监会宣布财务核查已经完成,而完成财务核查是重启 IPO 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,并且,刚实行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,也为 IPO 重启提供了必要的前期铺垫。可以说,IPO 虽然没有重启,有关为重启所做的准备工作,一刻都没有停止。所以,从时间上看,明年年初重启的可能性几乎是确定的。而在此种情况下的 IPO 重启,上市公司的质量会有实质性的提高。这虽然在上时间上比预期上晚了几个月,但改革的内容上会是实质性的。

《中国企业报》:IPO 重启的时间如果继续推迟,这会不会引发资本市场新一轮发酵效应?券商、投行以

及拟上市企业该何去何从?

柯荆民:市场对 IPO 的推迟已经有心理预期,所以不会有太多的反应。就券商和投行而言,企业上市的体制变得越发透明,对于中介机构的水准要求就越发提高。比如说,由于要加强信息披露,实现提交即公布。这样,要求提交给证监会的文件,质量水平有实质性提高,不但要逻辑性强,着重细节,更要求一步到位,提交后再进行修改会变得非常困难。

在明年年初 IPO 重启之前的几个月,我认为企业可以采用以下对策:首先,由于政府在推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,符合条件的企业,可以考虑去新三板上市。新三板扩容已经是势不可挡。同样,中小板核查内容较少,相对而言,申报报告要求不高。另外,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后,相关政策就会明朗,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意见稿随之会很快出台,可以根据三中全会的原则和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意见,随时修改申报材料。

寻求改革突破口 需要主动付出成本

(上接第一版)

其次,伤害政府公信力是一种长期的风险和成本,为了保持和提升政府的形象和运行效力,保持和增加人民群众安全感,付出相应的成本是尊重现有法律和制度的必需选择。毋庸讳言,中国改革初始阶段为减少改革成本,“大胆”地打破了当时的法律和制度,以“无代价”或“极少代价”的方式剥夺了一些群体在当时体制下的合法利益。以政府的失信为起点,逐步扩展成全社会的信用风险。目前中国社会的诚信和互信程度正在面临着种种考验,由此导致了交易成本的畸高,与现代商业文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和谐,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。这样的历史不能重演。

比如,不久前出现工行和建行前员工“散步”事件,就是因为两个单位在此前改革中为“买断工龄”所付出的成本不够以及未能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动态发展情况所致。当前,民众的民主意识、法律意识、维权意识较上一轮改革时,已经大幅度提高,如果不能为改革支付其所能接受的最低成本,将有引发实质性冲突的风险。

再次,改革必然有一个“试错”的过程,如果不肯为这种“试错”付出成本,而是期待有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,改革就完全无法推进。在上一轮改革中,许多“闯红灯”式的改革都突破了当时的法律底线,导致一些并无私心、私利的改革者产生了所谓“原罪”。而这些“原罪”也成为改革者脚下随时可能被触发的“地雷”。特别是一些同时期的改革者被“秋后算账”的案例不断增加,更是让他们时刻都担心会有入狱或获刑的风险。

这样一种情绪的蔓延,导致全社会对于改革有着过分期待所谓“顶层设计”的倾向,而事实是,大量的实践性问题是发生在基层,基层对于改革应当有着更多、更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。为了发动基层的智慧和力量,必须给出试错的范围和空间,在尊重现在法律和制度的同时,又要体现出对改革和改革者的宽容,让改革有更大的腾挪余地,为改革者大胆地试、大胆地闯吃下定心丸。

没有成本,就没有收益。期望无条件、无代价地对利益格局进行调整,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。事实上,主动付出成本远比被动承担风险代价要小得多。既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,我们就应当有更积极意愿去付出必要的成本。

四季度工业 增速面临回落风险

(上接第一版)

上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,四季度企业利润仍面临压力。从经济增长角度看,四季度出口增速恐受新兴经济体增长乏力而出现回落。

此外,国家公布的从业人员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反季节回落,或预示后续经济景气指数动能不足。9 月从业人员环比下降 0.2 个百分点,9 月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反季节回落了 1.0 个百分点,或预示后续经济景气指数动能不足。

温州一家鞋厂负责人告诉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,从去年至今,招工难的现象并未缓解,且变得愈发严重。整个工厂处在一种收缩的状态。

中国众多的中小工业企业并未随着投资拉动出现转好的迹象。该鞋厂负责人告诉记者,现在基本都是为工人在打工,老板不赚钱。他的这番话得到了不少中小制造企业的认同。

交通银行的报告显示,在大型企业 PMI 连续强劲反弹的同时,中小企业 PMI 仍低于“50 荣枯线”以下。中型企业 PMI 为 49.7%,较上月微升 0.1 个百分点,小型企业 PMI 为 48.8%,相比上月反而下降了 0.4 个百分点,创下了近四个月的新低,微观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依然不容乐观。

警惕虚假繁荣

在“保增长”压力下,不少地方政府开始疯狂追求项目的投资拉动。追求大项目落地,成为了各个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,而“调结构”则放在了次要的位置。

以陕西省和湖南省为例,陕西省设定今年四季度工业增长目标是“保 13% 争 14%,力争完成全年任务”。为此,各地市纷纷提出对策,“加快项目建设,全力开展招商”成为不少地方的不二选择。湖南省也在国庆节后铆足了劲,该省认为一些主要人均经济指标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,还处于负重爬坡、后发赶超的阶段,力争年内要切实守住经济增速 10% 以上的底线。

“现在地方政府也很矛盾,环保要求越来越高,但 GDP 的指标存在完不成的危险,一些固定投资额越大的项目,尤其是央企参与的项目,可以让地方政府有信心逃避环保的要求。”河北省一个县政府从事招商工作的李姓人士告诉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。

上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,这是一种“虚假繁荣”,很多大型工业企业被地方政府纷纷邀请到地方上进行投资,表面看,短时间内刺激了 GDP 的增长,但这种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并不是真实的,而且会导致新一轮的产能过剩问题。

“在下游需求并未真正改善的情况下,问题只会越累积越严重。”该专家告诉记者。

北京市属一家仪器制造企业高层人士告诉记者,外地的地方政府每天来公司进行招商的人近期很多,很多都是老领导、老关系户带来的,难以取舍。

“我们已经尽力了,但最多只能选择其中的 1/4 项目来操作。”该人士称。